

陳映真與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爭

◎ 陳建忠

雙陳論爭的緣起與發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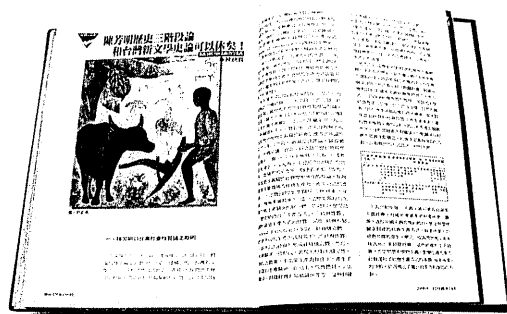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史的書寫，既牽涉到系譜學與美學評價的問題，就免不了要排出個上品、中品、下品來。然而這種排序如果已是動輒得咎，那麼，如果把自有文學史以來就已有的國族、性別、種族、社群、流派等問題加進來，可以肯定的說，文學史家著實無法避免爭議但又絕難處理得面面俱到。也因此，自來每一次關於文學史的書寫就是一次爭議的開端，這大概是並不為過的說法。而文學史論爭之為必然，更可看出文學史書寫牽涉廣泛的文學詮釋權的政治性格，這對於陳芳明與陳映真兩位先生（以下敬稱略）的文學史論爭來說，尤其如此。

這場「雙陳論爭」，爆發時間應溯至1999年，起因是陳映真對陳芳明正在

寫作的文學史提出批判，兩造之間一來一往數次，其中則穿插支持者零星的砲火，戰火直至2001年底才稍歇。歷數兩人的論爭文章按發表先後計有：陳芳明〈第一章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78，1999.8）、陳映真〈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——批評陳芳明先生的〈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〉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89，2000.7）、陳芳明〈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？——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90，2000.8）、陳映真〈關於台灣「社會性質」的進一步討論——答陳芳明先生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91，2000.9）、陳芳明〈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——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92，2000.10）、陳映真〈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——結束論爭的話〉（《聯合文學》194，2000.12）、陳芳明〈有這種統派，誰還需要馬克思？——三答陳映真的科學創見與知識發明〉（《聯合文學》202，2001.8）、陳映真，〈駁陳芳明再論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〉，《因為是祖國的緣故...》（人間出版社，2001.12）。

至於陳映真的支持者眾，隨後為文的計有曾健民〈「戰後再殖民論」的

圖2 雙陳論爭可說是戰後「統、獨文學史觀的再一次論辯。（林祝如攝）



顛倒——關於陳芳明的戰後文學史觀的歷史批判》(《聯合文學》195, 2001.1)、鄭國棟,〈跳蚤「左派」的滿紙荒唐言——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〉(上、中、下)(《左翼》15、16、18, 2001.1.31、2.28、4.30)、古遠清,〈台灣文壇「雙陳大戰」〉,《台聲》198, 2001.4)。陳芳明方面則似乎未見有正面的聲援者,然而這並不影響所謂「雙陳論爭」的主調,因為兩人的論點皆已在各自論文中陳述得相當清楚。

兩個重點：(1) 台灣社會性質論 (2) 戰後台灣(文學)「再殖民論」

雖然兩人的論爭字數總計有十五萬字之譜,並且討論的枝節問題不少,但最重要的爭議點,應在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「殖民地社會」或「殖民地、半封建社會」此種「台灣社會性質論」;以及在二戰之後,中國國民黨來台的統治方式,究竟是「再殖民」或「光復」,是「殖民者」或「獨裁者」,這樣兩個主要的重點。之所以要談論「社會性質」,是因為這牽涉到台灣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差異程度,牽涉到中國與台灣「融合」的困難度;而國府政權的殖民性格若確立,則中國形同外國,當然也就變成有兩種國家文學史。

陳映真認為要強調日據下台灣的半封建性(這與中國本部同步),戰後則強調新殖民地性質(台灣是受制於美國的威權體制),因此他說:「拙論初步主張台灣日據社會(1895~1945)是『殖民地·半封建社會』;1945到1950年是中國『半殖民地·半封建』社會的組成部分;1950年至1966年,是『新殖民地·半資本主義』社會;1966年到1985年左右,是『新殖民地·依附性資本主義』社會。而1985年到目前,是『新殖民地·依附性獨佔資本主義』的社會」(〈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〉)。

陳芳明則秉持「後殖民史觀」,對陳映真的批判提出辯駁:「為什麼陳映真不能容忍把日據下台灣稱為殖民地社會?理由是很清楚的。因為,台灣如果被定義為殖民地社會,則其經濟基礎、社會結構、生活方式就與中國社會出現巨大的區隔」;同時,「把戰後劃為再殖民時期,乃是針對失去母國的國民政府之統治性質給予定義。它實施的戒嚴體制,較諸總督體制,毫不遜色。依賴戒嚴體制的支配,強勢的中原文化才能夠透過宣傳媒體、教育制度與警察機構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權論述」(〈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?〉)。

兩方的論述基本上便是構築在上述

的兩個爭議點上，其餘以大量歷史資料與作品分析來佐證者，莫不都是爲了印證台灣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的關係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關係，其論證都充滿了濃厚的「政治色彩」。而所謂政治色彩，不僅僅是關於典律詮釋權的爭奪而已，還包括作者基於史觀與國家認同出發所做的價值判斷，其結論之南轅北轍，充分顯示了台灣文學史具足各種矛盾於一身的特性。

統、獨文學史觀的交鋒

文學史觀的問題原本就頗有爭議性，「雙陳論爭」的基調，與其說是針對台灣社會性質或統治方式的論辯，毋寧說是戰後以來「統、獨文學史觀」的再一次併發症。讓我們記憶猶新的當是七〇年代由葉石濤與陳映真引燃的「鄉土文學史論爭」中，鄉土派內部葉石濤與陳映真關於台灣文學定位的歧見。

對照雙方的觀點，明顯地可以看到文學史觀的競逐，其背後正是兩造關於國族想像圖像之差異，所謂統與獨的史觀，已然正式地公開論辯。一個強調差異，一個強調一統，顯影了各自不同的國族想像。

於是乎陳映真所針對的，毋寧不只是陳芳明，而是所謂「陳芳明們」，也

即是近年他所著力批判的「文學台獨論者」：「台獨派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若干刻板化、『主流』化的論說——比如說台灣新文學起源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不深；說三〇年代關於『台灣話文』（第一次）『鄉土文學』的論爭是『台灣意識』和『中國意識』的鬥爭；說一九四六～四九年台灣新文學論爭也是外省作家和本省作家矛盾對立的表現；說七〇年代末（第二次）『鄉土文學論爭』是『官方』＝外省作家和『民間』＝本省作家的矛盾，是台灣新文學『主體意識』的進一步發端」（〈駁陳芳明再論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〉）。

而另一方面，陳芳明則強硬地指出他與陳映真的差異，便在於陳映真是「抄襲」馬克思主義來進行「統一」的政治工程，而他自己則既提出理論也付諸寫史的實踐：「我的後殖民史觀，乃是以台灣社會、台灣歷史、台灣文學爲主體，在建構《台灣新文學史》時，我對每個階段的文學內容與精神，都能夠以後殖民史觀來詮釋」。至於陳映真則是：「他真正的理論只有一點：『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』。除此之外，他便索然無趣了。有這種統派，誰還需要馬克思？」（〈有這種統派，誰還需要馬克思？〉）

雙方的立場鮮明、互不相讓，甚至

以充滿歧視性的語詞奚落對手，這點並不難理解。但值得注目的是，這場文學史論爭挑動了台灣文學界敏感的「統獨問題」的神經，讓我們意識到台灣文學史與台灣人近百年來的命運一樣，都無法擺脫「政治」的干擾。無論讀者或作者，恐怕都不能對此一論爭的意義等閒視之。

壓迫、收編與抵抗：跨世紀的文學史角力

因而，雙陳的文學史論爭，絕對不能孤立地看待，此次事件其實是台灣文學史中迄今不曾癒合的傷口的再病發。我們應該深切地思索，為何台灣文學史始終無法超脫出這樣的病症糾纏？是誰，又是什麼樣的力量在召喚這一次次的病發？

從一個跨世紀的角度來看，日據時期台灣就已經出現數次關於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的論爭，著名的像島田謹二的「外地文學論」與黃得時的「台灣文學史」系列書寫，戰爭期又有所謂「糞現實主義論爭」在爭議台灣作家的現實主義是否對於皇民文學有所裨益。至於戰後初期文壇，雖然有不少有心的中國文化人來台，但依舊存在著「台灣有無文學」、「重建台灣文學」、「台灣文學如

何統一於中國文學」等論調。八〇年代的台灣意識論爭（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），其實就是葉陳在鄉論時期論爭的擴大化。到了九〇年代，陳昭瑛與陳芳明引發的「台灣文化論爭」，也無非是統獨雙方關於台灣文化（亦涉及文學）定位的論爭。

早在統獨論爭之前，台灣文學即已面對殖民主義文學史觀的壓制，台灣作家也試圖抵抗。所以說，關於台灣文學定位問題是統獨兩派的專利，恐怕與史實不符。事實上，在外來統治者意圖壓迫、收編的時候，本土人民積極抵抗的行為，恐怕才是台灣文學的真精神。必須要意識到這點，才是台灣文學史跨世紀病症的病灶所在，也才是我們思索問題的關鍵所在。

歷史、認同、主體：尋找台灣文學史的定位

從台灣文學史「不絕如縷」的論爭病症來看，這種歷史的一再重演，正顯示台灣文學中複雜的國族認同問題一直懸而未決。誰是文學史的主體？從「去政治化」的思考來看，似乎沒有必要為國界、種族等人為的藩籬而設限，理應有一種世界文學史或以讀者為主的文學史即可。然而，歷史不以我們個人的意

志而轉移，國家文學框架也無法驟然撤除，我們必須要嚴肅地面對台灣文學史定位難明的百年糾結，尋找出台灣人的文學歷史認同。

台灣文學史與台灣社會的認同問題一樣，存在著太多複雜甚至矛盾的狀況，台灣文學史究竟要寫成什麼樣子，就是台灣人如何認識他自己的再現。讀者並不寫文學史，但文學史家如何寫文學史卻是值得討論，而且也能藉此印證我們自己心目中那個理想台灣文學史的面目，也認識我們自己。只不過，「雙陳論爭」無情地提醒我們此問題暫無解套的可能，而這不也是暗示，距離尋找真正的台灣自我，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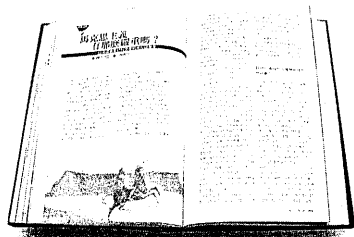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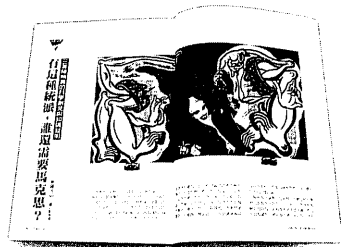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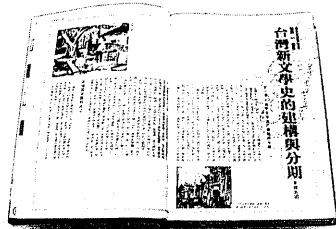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陳映真對陳芳明在《聯合文學》發表的文學史觀提出批判，引發雙陳的爭論。
(林祝如攝)